

【共和国史研究】

多维视角下的三线建设研究(笔谈)

徐有威 张勇 段伟 苏世奇

【原刊编者按】三线建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次规模空前、影响深远的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大三线建设主要在内陆西南和西北地区展开,小三线建设主要在一、二线(沿海沿边)地区的腹地进行。大、小三线建设相互策动,不仅对加强国防实力、改变工业布局等有积极意义,客观上也为西部地区和内地城市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近年来,三线建设研究异军突起,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为了推动三线建设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本刊约请国内相关学者展开笔谈。这组笔谈既有对小三线建设研究民间文献的梳理,也有以三线建设研究为切入点进行多学科融通的探讨;既有历史地理维度的考察,也有艺术史视角的呈现,体现了三线建设研究的多维视角。

民间文献和小三线建设研究

徐有威

【作者简介】徐有威,上海大学历史系。

【原文出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武汉),2021.1.131~13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小三线建设资料的整理与研究”(13&ZD09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保护与创新利用的路径研究”(17ZDA20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公众历史记录理论与实践研究”(19ZDA19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2020年基地项目”(20KRIZYYB05);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文化单列课题“贵州‘三线建设’口述史料搜集整理与研究”(19GZWH03);“贵州三线建设文艺研究创新团队”(LPSSYKJTD201910)。

—

20世纪60年代中期,面对云谲波诡的国际局势,出于对国内工业布局不平衡、不合理的担忧,中共中央在分析时局之后作出了实施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三线建设于1964年开始正式启动,由大、小三线建设两部分组成,结束于20世纪八九十年

代。大三线建设主要在内陆西南和西北地区展开,小三线建设则主要在全国一、二线(沿海沿边)28个省区市的腹地进行。两者都为三线建设战略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和价值。

近年来,中国当代史学术界对于民间文献的研究处于升温趋势。目前对于民间文献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民间文献是指保存在民间的、承载着历史文化信息的所有文献。狭义上的民间文献则专指直接产生并保存在民间的文献。笔者认为,小三线建设民间文献的内涵也呈多元趋势。凡属小三线建设时期的,无论其作者是否是三线建设亲历者,只要是记述与小三线建设有关的、并且保存在民间的文献,都可称之为小三线建设民间文献。

民间文献在小三线建设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出于备战的需要,小三线建设在建设期间始终处于保密状态。当时提及“小三线建设”时,大多是用“内迁”和“支内”等字样代替。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小三线建设迎来了调整改革的新阶段,官方对小三线建设的报道才逐渐增多。到目前为止,有关小三线建设的官方档案还在缓慢公开的过程中。如果仅仅依靠官方档案资料来对小三线建设进行系统性的研究,绝对是不够充分和全面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民间文献对于小三线建设研

究具有更重要的价值。如果说官方文献能够为小三线建设研究提供一条主线、一个框架,那么民间文献则能够使其充实丰富,具有立体感。只有注重对官方文献和民间文献的结合使用,发挥各自的特点与优势,才有可能推动小三线建设研究的持续深入。与此同时,作为中国当代史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小三线建设民间文献的搜集利用,能为中国当代史其他方向的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和帮助。从这一意义上说,小三线建设民间文献是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又一史料宝库,值得深入挖掘与利用。

二

小三线建设民间文献作为中国当代民间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研究小三线建设提供了更宽广的视野和平台。因此,小三线建设民间文献的搜集整理也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重视。小三线建设民间文献大致包含厂志、日记、工作笔记以及小三线建设亲历者的自印本回忆录等。这些都是研究小三线建设不可多得的文献史料。

第一,厂志。小三线建设战略实施于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由于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小三线建设实行的是“工厂办社会”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工厂职工的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都由工厂来包办。因此,每个工厂作为一个单位就类似于一个小社会,每个厂都是三线建设这幅历史画卷的一个缩影,见证了三线建设的发展变迁。通过研读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小三线企业厂志大致包含以下内容:小三线企业单位的整体情况、生产情况、经营管理与党群组织、文化、技术教育、职工生活与福利保障等。小三线企业厂志较为全面地记录了各厂的发展历程,对于了解某一小三线企业的发展变迁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当然,受各种因素的限制,并非所有的小三线企业都有厂志,也并非所有小三线厂志的撰写都完全符合规范。尽管从厂志的编写来说,可能会有一定的遗憾,但是从价值层面来说,其意义依然不可小觑。另外,到目前为止搜集整理出来的小三线厂志仅仅是其总数的一小部分,还有许多小三线企业厂志等待我们去搜集和保存。因此,尽可能地去搜集整理小三线厂志并加以保存是一件刻不

容缓的事情。如果能够对全国的小三线厂志进行系统性的搜集整理,必将推动小三线建设研究迈向更为广阔的天地。

第二,日记。日记是一种独特而珍贵的史料,它忠实地反映了记录者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内容广泛,大到国家政治,小到家长里短,既有家国情怀,也有儿女情长。从史料学角度看,日记因其作者的亲历者身份,常被视为第一手史料,由此可见日记作为史料的重要意义。从小三线建设的视角来说,由于其覆盖地域广泛、涉及人员众多,其中必然有部分重要的日记值得关注和重视。

总之,这些小三线建设亲历者日记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他们看待三线建设的视角各不相同,这种不同可能是由于地域上的差别,也可能是由于各自工作经历的差别。正是因为有这些差别的存在,使我们能够看到更加多元、更加立体、更加鲜活的小三线建设,而这样生动的小三线建设在官方档案中是很难看到的。因此小三线建设亲历者的日记具有其独特价值。当然,由于日记是个人的日常生活记录,难免会带有记录者的主观情绪,而且基于自身的视角来看问题难免会有以偏概全之疑,因此将这些个人日记作为史料来使用时,应当科学合理地引用。如果将其同政府档案、企业档案、厂志等相结合,研究视角会更加全面和客观。

第三,工作笔记。同日记相比,工作笔记抛去了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描述,只关注工作本身的记录,尽管在可读性、趣味性方面可能不如日记,但是从史料价值的层面来说却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

第四,自印本回忆录。回忆录是记录当事人回顾自身经历所形成的文字或音像资料。因此,自印本回忆录对于历史问题的研究同样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在小三线建设研究过程中,未刊回忆录是经常被引用的一种史料。目前这部分史料的数量仍在不断增加,因此其史料价值同样是不容小觑的。根据笔者对小三线建设亲历者自印本回忆录的搜集与整理,这些资料大致可以分为个人回忆录和集体回忆录汇编两种类型。这些回忆录的作者以亲历者的身份,不仅对小三线建设进行了回顾,同时也

对小三线建设作出了评价。因此,无论是对研究者来说,还是对普通读者来说,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阅读价值。

三

小三线建设民间文献种类繁多,内容丰富,视角多元,其所蕴含的价值不可低估。

第一,史料价值。近年来,小三线建设研究在一大批专家学者的辛勤耕耘下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重视。但是,正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由于部分官方档案资料尚未公开,许多问题还无法深入研究。面对这一情况,小三线建设民间文献正日益走入研究者的视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尝试利用民间文献这把钥匙来打开三线建设研究新领域的大门。在这里,民间文献大有用武之地。

第二,社会价值。小三线建设民间文献除了具有不可小觑的史料价值外,同其他民间文献相比,亦有较大的社会价值,不应被忽视。正如参与上海小三线建设研究的上海大学历史系2017届硕士研究生杨帅所说,从事小三线建设的研究,不仅仅是为了更接近历史的真实,还能通过大量口述资料、与亲历者的交流以及保留的书信、日记等资料有机会接触到鲜活的历史和那些离我们不远的普通人生活的轨迹。从这点上来说,小三线建设研究有重要的意义(杨帅:《触摸鲜活的历史:我亲历的小三线研究》,见徐有威、陈东林主编:《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第1辑),上海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02页)。因此,小三线建设研究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其研究本身,更是历史和现实之间实现互动的一条纽带。它让历史不再只停留于故纸堆当中,而是普通百姓可以去接触和体会的。这些民间文献的生动呈现,不仅仅可以使普通人去了解什么是三线建设,更进一步说,可以使普通人感受到历史其实就是曾经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从而拉近普通人和历史之间的距离,使历史真正能够走近千家万户。从这一点来说,以小三线建设民间文献为代表的当代中国民间文献具有其独特的社会价值,而这方面的价值还有待进一步挖掘和利用。

第三,情感价值。对于小三线建设亲历者来说,

小三线建设民间文献是一份宝贵的财富。这些文献对小三线建设亲历者来说具有珍藏的价值,同时也表达了后辈对这些前辈的敬意与感恩,这是其情感价值的体现。

四

在中国当代史的研究版图中,小三线建设研究方兴未艾。小三线建设民间文献的搜集整理与利用是解锁这些问题的钥匙之一,具有独特的价值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尽管当前已有学者开始注意对这些文献进行搜集与整理,但是整体关注度还不高。因此对于这些文献的搜集与整理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特别是考虑到小三线建设分布广泛,各地情况有所不同,相关文献资料的保存情况也有差别,在这种情况下,对这部分文献的搜集与整理更是当务之急。

当然,作为民间文献的一种,小三线建设民间文献也存在其不足之处。由于小三线建设民间文献主要来源于小三线职工的日记、笔记、自印本回忆录等,往往含有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因此我们在使用这些材料的过程中要加以取舍,特别是在史料的准确性和客观性方面需要进一步求证,也需要将其同档案文献相结合来保证论证的严谨性。尽管如此,民间文献所蕴含的价值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在目前有关三线建设的官方档案还未完全公开的情况下,这些民间文献对于小三线建设细节的勾勒、事件的叙述、人物的记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对于这些文献的搜集与整理才会显得如此重要。

当我们单独去看某份小三线建设民间文献的时候,或许会感到无足轻重。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些散落的小三线建设民间文献加以系统搜集和整理,呈现出来的就是一幅令人震撼的小三线建设历史画卷。若再辅以官方档案、其他相关文献以及口述史资料的勾勒,小三线建设的历史画卷将变得更加清晰。相信在专家学者、社会人士的关心和带动下,特别是在小三线建设亲历者的协助下,民间文献将在小三线建设研究中呈现出与众不同的一抹亮色,从而助力小三线建设研究乃至中国当代史研究不断取得更新、更大的成果。

在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中突破学科藩篱

——以三线建设研究为切入点

张勇

【作者简介】张勇，四川外国语大学社会与法学院。

【原文出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武汉），2021.1.133～137

一、当代中国研究与学科融通

当代中国研究(Modern China Studies)，是1949年后源自西方尤其是美国学术界有关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历史与文化等诸方面的多学科研究，经历了长期的学术积累和发展历程，如今已成为有许多中国本土学者参与的关于中国社会变迁与发展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

相较于海外的研究而言，国内的当代中国研究起步较晚，1978年之后才真正兴起，此前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在中国基本都已夭折。改革开放后社会科学的复兴以及中国经济、社会、文化日新月异的变化，激发了学术界对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浓厚兴趣，并在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取得成效。以历史学为例，与西方史学家近些年才重视中国当代史研究不同，国内的历史学者自1978年之后就对这一领域倾注了较多的精力，分别从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外交史以及中共党史等角度进行了研究，近十年来更有许多年轻学者开始涉足这一领域，甚至有史学家呼吁建构中国当代史的学科体系。不过，尽管有部分学者意识到当代史研究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但不少历史学者在其深层次观念中，依旧恪守史学的学科边界，与其他学科研究者的合作仍然阙如，更遑论多学科的融会贯通。而一些影响颇大、成就斐然的交叉学科(如历史地理学、社会史、历史人类学等)，研究者大都将目光聚焦于近代之前的历史与社会，尚未将交叉研究的视野延展至当代中国研究这片“沃土”。

历史学以外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对当代中国的关注，则主要聚焦于1978年之后的当下问题，对此前的

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鲜有问津，研究“多半缺乏确实的历史维度”(冯筱才：《跨过1949：二十世纪中国整体研究刍议》，《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虽然社会学界近年来大力倡导社会学的“历史转向”，强调社会学研究应具有历史的维度，历史社会学在中国方兴未艾，但是，与前述交叉学科相类似，历史社会学的研究者除了研究中共党史、革命史以及社会主义集体化等为数不多的当代中国议题之外，更多的探讨反而投向了古代社会的礼制、官治、世变和民国时期的思想史、社会史等研究领域，这同样是一种缺憾。

实际上，在当代中国研究中更易突破学科藩篱，实现跨学科、交叉学科乃至多学科的融通研究。其可能性首先在于各学科研究对象的交叉重叠和研究方法可相互借鉴。不论是历史学，还是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关注的都是1949年之后中国的各种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正如英国著名史学家巴勒克拉夫所言，“当代社会与过去社会之间的分界线是微妙的，不断变动的，而且是人为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0页)，当下性的特点使得两者之间很难划出一条清晰的界限。各学科研究的对象大多重叠，只是观察视角和研究方法不同，因而没有严格的学科分界，研究者都在述说“中国故事”的基础上探寻当代中国之规律。虽然不同学科有着不同的学术理念与研究手段，但研究时限的接近和研究对象的重叠，更有利于各学科理论与方法的相互借鉴。譬如，田野调查方法不仅在社会学、人类学中得到广泛运用，历史学者在研究当代中国问题时也常常走出书斋，到田野中收集资料、观察社会、反思当下。可见，当代中国研究中的学科界限并非想象中那么严格，研究者也没必要画地为牢，自筑藩篱。

从各学科追求的要旨来看，当代中国研究更有助于其达成研究目标。从历史学来看，其旨趣在于求真，即探寻历史真相、复原历史面貌。在此要旨的追求上，当代史和古代史、近代史相比更具先天优势。一是在资料方面，当代史的资料可谓“浩如烟海”，不可估量。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史料越丰

厚,越有利于历史面貌的复原。二是当代史研究更易回到“历史现场”。陈寅恪先生认为,“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7页)。当代中国问题离我们的生活和经验最近,研究者与当代人物处“同一境界”,更易达成“了解之同情”,更“有可能整体把握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通过人物心路历程之真逐渐接近历史真相”(桑兵:《从眼光向下回到历史现场——社会人类学对近代中国史学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三是在当代问题研究中,更易运用社会科学的田野调查等研究方法。当代史的人物对象还有不少健在在世,口述访谈可以发挥其最大功效,弥补档案文献之不足;对在世者生活及状态的观察,可以加深研究者对历史情境与文化的感悟;到历史事件发生且保留下来的场所进行实地考察,能从空间现场的角度增强对历史的理解。当代史研究所拥有的这些先天优势,有助于研究者探寻历史真相,也有利于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交流与合作。

再来看作为社会科学代表的社会学,其要旨在于分析和解释各种社会结构和社会行为。近十多年来,社会学界大力呼吁社会学研究的“历史转向”,重拾历史的维度,以增强理论解释力。但社会学者自身也认识到,他们来做历史问题的研究,“会面临一个专业能力的难题,即社会学家无能力与历史学家对话”(肖瑛:《非历史无创新——中国社会学的历史转向》,《学术月刊》2016年第9期)。社会学者之所以存在“专业能力的难题”,既由于对历史知识的长期疏远和史料深度解读能力的相对缺乏,也在于其不易置身“历史情境”,从中获得“历史场景感”。不过,如果说面对近代之前的历史话题,社会学者的专业困窘容易被显现出来,那么在当代研究领域其困窘感则会大大降低。社会学者还可以借助理论与方法的优势大展拳脚,增强与历史学者之间的对话能力。

任何学术研究都要面对现实世界,而现实世界是一个由各种事物普遍联系在一起的浑然的整体。凭借单一的学科往往无法解决现实世界的复杂性问

题,当代中国问题研究更是如此。如何突破学科藩篱,生产出真正有生命力的学术,如何有效介入时代重大命题,回应时代关切,成为摆在当代中国研究者面前的重要议题。由此,围绕某些重大问题,采取多学科合作的方式展开综合研究,将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大趋势。

在当代中国研究中,若干具有时代意义的重大问题值得高度关注。例如,土改运动、“文化大革命”、知青上山下乡、工业化建设、国企改革、西部大开发、改革开放、城市化进程、城乡关系变迁等等,都是时代关切的重大问题。学界有必要打破学科壁垒,围绕某些重大问题开展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二、以三线建设研究为突破学科藩篱的切入点

在1949年至今的当代中国重大问题中,三线建设研究无疑是最具发展潜力的研究领域之一。三线建设是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一场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在中西部地区的13个省、自治区投入了2000多亿元巨资,建成1945家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此外,还有“小三线”建设项目广泛地分布在全国除台湾和西藏之外的28个省区市的腹地。三线建设横贯三个“五年计划”,其调整改造一直到21世纪初才结束,对我国的国防安全、经济布局、社会发展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三线建设研究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和突出的现实意义,可成为实现多学科综合研究的突破口。

以三线建设研究作为突破学科藩篱的切入点,一方面是基于目前该领域蓬勃发展态势的考虑。由于三线建设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独特的研究价值,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相关研究成果便不断涌现,逐渐成为当代中国研究中的一大热点,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各类文献资料、档案材料、口述史料、回忆文集层出不穷,并得到整理甚至出版;研究著作和论文也日益增多,仅2019年就问世了9本著作,发表了140篇相关论文;有10多项有关三线建设研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获得资助,其中包括2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各地相继举办三线建设研究相关的研讨会,仅2019年

就召开了5次;数家重要学术期刊先后刊发多组三线建设的专题文章,有的还设置了“三线建设研究”专栏,定期发表相关学术论文。近年来三线建设研究可谓异军突起,影响渐深。

另一方面,和当代中国研究中的其他重大问题相比,三线建设的研究优势更为明显。第一,三线建设领域的议题广泛,可回避某些敏感问题。笔者常说,三线建设是一座“富矿”,研究者可以从中挖掘出足够丰富的“宝藏”。三线建设涉及的话题不仅限于经济领域,也可以从政治、社会、文化、军事、外交、环境等领域展开研究。以社会史为例,三线建设时期的教育、医疗、生产、消费、建筑、交通,以及移民、工人、农民及其婚姻、家庭、生育、饮食、语言、群体构成、思想观念、风俗习惯、文化娱乐、身份认同、社会关系等,皆有待深入探究。同时,和土改运动、“文化大革命”、知青上山下乡等领域相比,三线建设的政治敏感性较低,因而有足够可开拓的研究空间。

第二,中国学者对三线建设的研究具有先天优势。当代中国研究最初由西方尤其是美国学术界发起,在很多领域西方学界具有累积而成的领先优势,以致有学者呼吁应该确立中国学术的主体性,争取更大的学术话语权。然而,目前在三线建设研究中,国外学者尚未形成显著的领先优势。原因在于,不论是在档案资料的搜集与整理、文本的解读,还是在田野调查以及历史情境的体验与理解等方面,中国学者都具有天然的主场优势,而这通常是国外学者难以企及的。

第三,三线建设研究可连通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兼顾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这场重大的经济建设对当下的中国社会仍有深刻的影响,一些三线单位和大量“三线人”依然存在,并面临着诸多方面的现实问题。三线建设研究不仅探讨历史现象,也关注当下的现实问题;不仅涵盖经济建设、社会结构、文化变迁等领域的基础理论研究,也涉及社区发展、遗产保护等方面的应用研究。因此,三线建设研究能勾连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具有极大的开放性。

第四,三线建设研究已具有多学科合作的基础。笔者在2014年就指出,三线建设研究呈现从以

历史学为主逐渐向多学科、交叉学科转变的趋势(张勇:《社会史视野中的三线建设研究》,《甘肃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如今看来,这种趋势愈发明显。除了较早介入的经济学、管理学、历史学外,社会学、政治学、地理学、建筑学、城乡规划学在三线建设研究领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人类学、语言学、传播学、艺术学等其他学科也开始涉足该研究领域。虽然这些学科皆从本学科的视角开展相关问题研究,却为多学科的合作研究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三线建设这座“富矿”所蕴藏的种种潜在优势,既是三线建设研究近些年得以蓬勃发展的重要原因,也是可将其作为突破学科藩篱的切入口、实现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内生动力。

三、三线建设多学科研究之构想

虽然在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中,三线建设研究领域进行多学科研究的潜力与优势甚为明显,但是目前介入三线建设研究的这些学科多从各自的学科视角出发研究相关专题,缺乏相互交流与合作,更不用说学科之间的融会贯通。在当今学科专业趋于细分、学科边界意识明晰、学科场域“惯习”强大的背景下,打破学科藩篱更需有意而为之。如何在三线建设研究领域实现多学科的交叉与融合,促进三线建设研究的深入发展,笔者提出以下几点构想。

首先,厘清多学科合作的内在机理,构建综合研究体系。已涉足三线建设研究领域的不同学科,如果只是各自在这座“富矿”中挖掘“宝藏”,短期内也许会成果迭出,但最终却很难形成合力,完成对这一重大问题的综合性考察。其实,介入三线建设研究的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之间存在紧密的内在联系。我们可以根据这些学科的研究属性、研究对象与特点,搭建综合研究的学科构架。在这些学科中,历史学侧重时间叙事,地理学关注空间要素,社会学探讨社会结构与社会行为,人类学强调主客位视角。时间、空间、社会、主客位视角这四个最基本的学科元素组合在一起,便可构建起三线建设研究的多学科体系。并且,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这四门学科虽各有侧重,但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手段上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人,是这四门学

科共有的研究对象,研究“人及其文化”的人类学、关照历史中人物的历史学、探讨由人群所组成的“社会”的社会学自不必言,就连地理学的研究核心之一也是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文献分析与田野调查则是这四门学科都常常采用的研究手段。在三线建设研究中,搜集、整理企业史志、档案、口述史料、影像资料等各类文献是夯实研究的基础,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应遵循材料本身的叙述逻辑,在比对、甄别的基础上进行细致而深入的解读。田野调查不仅是人类学的“专利”,社会学、地理学甚至历史学在研究三线建设这类当代中国问题时,也必须重视田野调查的作用,在研究中将文献分析与田野调查相结合。

其次,逐步形成开放包容、学科交叉、交流密切的三线建设研究学术团队。良好的学术团队和学术平台是研究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开放包容、学科交叉的学术团队取得突出成绩者不乏先例,“年鉴学派”“华南学派”等学术共同体便是成功的典范。当然,这些学派不易仿效,短期内在三线研究学者中形成理念与方法相近的学术共同体也不太现实。然而,由于三线建设研究的潜在优势和众多研究者的加入,目前已形成了若干各具特色的小型研究团体。例如,上海大学的徐有威团队对全国各地的“小三线”建设进行了多项专题研究,四川外国语大学的三线建设与社会发展研究所从历史学和社会学结合的角度对三线建设开展交叉研究,华中科技大学谭刚毅团队从建筑学和规划学视角出发研究三线建设的环境、工业遗产,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涉足三线建设领域的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一方面可以从各自的学科背景出发,发挥其专业优势,进行专题研究;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合作与交流,彼此相互激荡与启迪,方能碰撞出更多的思想火花,甚至产生新的交叉领域。

再次,积极倡导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借鉴,提升问题意识。任何一门学科,都依靠着其他学科,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从汲取生命力,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从中获得自己进步的机会”(杰弗里·巴勒克拉克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6页)。如何吸收对方的特长,特别是研

究方法与理论的相互借鉴,是学科交叉与融合的关键。在三线建设研究中,历史学和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必须在方法论上彼此走向对方的纵深处,取长补短。历史学家于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与分析,社会科学研究者应向其学习,尽可能地动手处理一手资料,认识到每一类资料都有其局限性,在不同时段、媒介、部门和不同性质的资料的比对、分析中找到接近事实的表述。社会科学则长于对各类现象进行一般性规律的探讨和理论分析,历史学者应增强对社会科学理论的学习,不仅要关注各种“中层理论”,更应在经典的宏观理论传统中长期浸染。问题意识也是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应注意提升的重点。目前三线建设的相关研究成果虽然数量众多,但水平参差不齐,重复性或同质性研究较多。“问题意识”薄弱是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一些研究者停留于对事件或现象的叙述与再现,在论述“是什么”之后往往未进一步探寻“为什么”。除了受学科属性的影响之外,这也和研究者缺乏对该领域整体研究脉络的梳理有关。具体到研究成果尤其是学术论文中,文献综述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制约了作者问题意识的展现。当然,同当代中国研究的其他领域一样,三线建设研究中各学科对于西方理论与方法的借鉴,都不应简单套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来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而应该在各种具体现象中找寻研究问题,再围绕“问题”进行经验研究之积累,进而构建自身的概念与理论体系。

第四,拓展三线建设研究空间,加强和不同研究领域的比较与对话。研究者需要从长时段出发,将三线建设置于全球史、整体史的背景下分析其成因和影响;将研究目光回溯到20世纪60年代之前,甚至1949年之前,探寻单位制的渊源、工业建设的形成;将目光延伸至80年代之后,分析三线建设的调整改造、三线社区的转型与城乡关系的变迁。从历时性和共时性角度进行比较研究,纵向比较三线建设与抗战内迁、明代屯堡移民,横向比较三线建设与新疆建设兵团、三峡移民的背景、政策与影响,在强调“大历史”视野的同时,注意宏观叙事与微观研究相结合。此外,三线建设的研究不能止步于该领域本

身,造成自我闭环,而要与当代中国研究的其他领域进行交流与对话。这些领域包括“文化大革命”、知青上山下乡以及改革开放、工业建设、城市化、社区发展、城乡关系、西部大开发等,都可成为三线研究对话的对象。如此,方能“走出三线建设”,走向当代中国研究,回应更宏大的时代命题。

最后,需要说明两点。其一,提倡多学科的融通与综合研究,并非否定已有的学科,而是不同学科应摒弃彼此之间的“傲慢与偏见”,保持良性的张力。正如应星所言,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必须深刻意识到自身的局限,要有耐心走到对方学科的纵深处去探问,要有勇气承受史学和社会科学关于我们“四不像”或“扬短避长”的批评,逐渐从角色的互换走向自我的涅槃(应星:《交界·交叉·交融——浅论史学与社会科学在“新革命史”中的结合》,《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11期)。其二,多学科研究既要打破学科藩篱,也要秉承关怀现实、经世致用的理念,连接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兼顾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加强学界与政府部门、文化机构、亲历者以及普通公众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如此才能整合多学科和社会各界的力量,发挥学术研究服务社会的功效。通过三线建设研究领域综合性研究的尝试,在当代中国研究中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构建多学科研究的体系,促进不同学科的交叉与融合,打通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从而回应时代关切的命题,这或许可以成为当代中国研究的一个重要路径。

从历史地理维度看中国的三线建设

段伟

【作者简介】段伟,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原文出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武汉),2021.1.137~142

三线建设是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如何评价三线建设,学界众说纷纭,批判者有之,赞成者亦不少。吕思勉说:“史事复杂,利害很难就一时一地之事论断。”(《吕著中国通史》,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1992年,第360页)宁可在谈论历史效应问题时也曾说:“任何一个历史活动都不是孤立的,它是由许多过去的当时的历史因素历史条件综合起来的结果,而一个历史活动的作用,效应影响,又是许多个人、群体、层面等等历史因素、历史条件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我们不要孤立地静止地看待历史,而要从各个方面的相互关系的、运动的角度来把握历史。”(《史学理论研讨讲义》,鹭江出版社,2005年,第41页)这样的论断同样适用于讨论三线建设。目前,学界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等角度论述三线建设的研究很多,但从历史地理维度解读三线建设的成果还较为少见。“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如果找不到舞台,哪里看得到戏剧!”(谭其骧、顾颉刚:《发刊词》,《禹贡》第一卷第一期,1934年2月)三线建设是结合我国的地理格局而诞生的特殊时期的国家重大决策。要想深入研究这段历史,从历史地理维度进行考察是必不可少的。

如何从历史地理维度探析三线建设,张勇、王毅等人写过多篇论文进行了实证研究,给我们很多启发。笔者以为可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尝试。在此抛砖引玉,敬请方家指正。

一、从全球历史地缘结构来看三线建设的合理性

新中国的建立,历尽艰辛。建国初期,新中国百废待兴,国际上面临美、英等国家的孤立,只有苏联等少数国家予以承认,国家安全成为国家领导人时刻考虑的重要问题。夏立平在《中国国家安全与地缘政治》中指出:“国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系指关乎国家兴衰存亡的大事,包括国家政权和制度的安全、主权受到尊重、领土完整得到维护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页)在冷战结束以前,国家安全主要指军事安全。冷战时期,中国是居于世界两大阵营交汇点的唯一大国,受到两个超级大国的轮番追求或威胁,处境十分危险。从1950年开始的抗美援朝,到1962年的对印度自卫反击战,以及1960年代加剧的中苏冲突,这些大小战争或争论无疑会影响国家领导人的政治决策。

国家领导人对时代主题的判断是决定三线建设

的前提性大观念。1964年4月25日,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提出一份报告,对经济建设如何防备突然袭击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当时的战备情况非常严重:(1)工业过于集中。全国14个百万人以上的大城市,集中了约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2)大城市人口多。全国有14个百万人以上和25个50万至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大都在沿海地区,防空尚无有效措施。(3)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城市附近,还缺乏应付敌人突然袭击的措施。(4)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一旦遭到破坏,将酿成巨大灾害。报告建议由国务院组织一个专案小组,根据国家经济的可能情况,研究并采取一些可行措施。这份报告反映的其实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工业格局。由于这种工业格局是自然形成的,当然不符合当代的战备需要。这种情况一旦与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形势、战备状态结合起来,就显得非常不利。报告立即引起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5月11日,在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的前夕,毛泽东听取了“三五”计划的汇报,表示“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之后,中央书记处开会进一步研究“三五”计划,认为要加强国防建设的重点和规模以及它同解决吃穿用的关系,必须安排得当。6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集中讲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改变计划方法。过去制订计划的方法基本上是学苏联的,要改变这种计划方法。我们的方针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按照这个方针制定计划,先看可能生产多少粮食,再看需要多少化肥、农药、机械、钢铁,还要考虑打仗的需要。二是进行备战。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决定战争最后胜利的并不是原子弹,而是常规武器(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实验成功,三线建设在这一年隆重开始,显然与毛泽东对战争武器的认识有关)。他提出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各省都要有军事工业,要自己造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子弹、炸药。毛泽东的话引起中央与会领导的共鸣,大家一致认为应在加强农业生产、解决人民吃穿用的同时,迅速展开三线建设,加

强战备。8月19日,李富春、罗瑞卿和薄一波三人联名,把国务院研究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意见,向毛泽东、党中央写了报告。报告提出:一切新的建设项目应摆在三线,并按照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布点,不要集中在某几个城市;一线的重要工厂和重点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要有计划地全部或部分搬迁到三线;不再新建大中型水库;恢复人民防空委员会,积极准备北京地下铁道的建设,考虑在上海、沈阳建设地下铁道。这些计划都是针对战备的安排。薄一波指出,“毛主席的军事战略思想有独到之处,他重视有备无患,但不强调‘御敌于国门之外’,而主张‘诱敌深入,关起门来打狗’。建设三线后方工业基地,正是他的这种战略思想的体现”(以上参见薄一波:《“三五”计划的制定与三线建设的展开》,见《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1197-1201页)。这种思想其实不仅仅是毛泽东战略思想的体现,也是当时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层的集体认识。

美国波士顿学院罗斯教授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表明,中国是在超级大国围困的环境下寻求边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毛泽东的革命言论中体现的外交政策,有着非常理性的安全政策成分,表达了中国由来已久的安全忧患。面对超级大国的威胁,中国没有多少选择,只能使用武力来保卫其领土的安全。”(《美中两个大国需要相互尊重对方的战略利益——访波士顿学院罗伯特·S.罗斯教授》,见陈舟编著:《美国的安全战略与东亚——美国著名国际战略专家访谈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94页)罗斯在与安德鲁·内森合著的《长城与空城计——中国对安全的寻求》中假设:“假如当年发生了最坏的情况——苏联或美国入侵——人民解放军的日子是不会好过的。……入侵者更有可能不会落入中国设下的陷阱,而是沿着边境发动有限的侵入,对中国的工业中心实施空中打击,使人民解放军没有多少办法进行报复。两个超级大国之所以没有入侵中国,更多的是由于苏美都担心在同中国交战的同时又彼此开战,后来则是由于中国的核威慑,而不是由于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威力或高超战略。”(新华出版社,1997

年,第135页)20世纪70年代,中国北面受到苏联的强大压力,南边又受到越南的挑衅,中国当时确实有防范美、苏打击的必要性。

1985年3月4日,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5页)。这种对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的认识,只有在20世纪80年代才会出现,之前一直是强调有战争的危险。当年6月4日,邓小平直接指出:“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认为就打世界大战来说,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6-127页)这种认识也决定了三线企业从这个时期开始转型,从军工类产品转向民用品生产,甚至迁厂、解散。

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强调备战的三线建设时期,随着国力的增强,中国重返联合国席位,与日本、美国相继建交,国际形势大为好转,三线建设的迫切性降低。一些三线企业并不是不计成本地去建设,而是有选择性地取消,或遇到困难后缓建、停止。青海的“三线”建设从1965年开始,到1973年就结束了,历时不到10年。这也是可以从历史地理维度进行分析的。

二、从国内历史地理格局看三线建设的必要性

20世纪60年代全国的经济地理格局,总的来说是东部地区发展较好,西部地区发展落后;从各省内来看,平原地区发展较好,山区发展落后。这个经济地理格局并不是短期形成的,而是近代以来就存在的,其原因甚至可再往上推及古代。中国近代经济地理格局大致形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吴松弟总结了其8个主要表现。这些表现在新中国成立后仍然存在,其中最令我们关注的是“现代工业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沿海沿江沿铁路成为城市主要分布地带”,“中国大的区域经济差异从南北差异为主转化为

东西差异为主”(《中国近代经济地理格局形成的机制与表现》,《史学月刊》2009年第8期),与前文所引1964年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的报告类似。这样的经济地理格局相比古代来说已经有所进步,但对于一个现代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是畸形的,需要进一步调整。从历史地理的维度来分析,还可以看到这些地区发展的希望。并不是所有三线地区自古以来都是落后地区,在近代甚至是古代,有些地区是比较繁荣的,如甘肃天水等地,有“金张掖、银武威,金银不换是天水”的美誉,文化发达,经济繁荣,并不是一般三线建设者印象中的苦寒之地。但这些地区在近代以来确实衰落了。这种衰落是与它们以前在全国的地位进行比较,也可能是与其自身发展的速度进行比较。由于这些地区在历史上曾经繁荣过,又是交通要道,只要重新建设,这些地区是有复兴希望的。

从各省内来看,每个省都有少数的繁荣城市,更多的是欠发达地区。如何发展省域经济,带动各个地区的发展?利用小三线建设集中精力发展山区和落后地区的经济文化也是可行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得不施行的办法。在经济发展上,既要考虑个别地区的优势发展,更要照顾整体的均衡发展。从企业的发展效率来看,将企业建在东部沿海地区,发展效率无疑是最大的。但如果都建在东部,则整个国家的发展就是畸形的,不仅容易遭受战争的破坏,即使是平时时期,局部地区的贫困仍会拖累整个国家的发展。协调发展是任何时代都应该考虑的主题。

三线企业建设也能起到加快城市化的建设的作用。1975年8月18日,邓小平曾对工业发展的有关问题讲了几点意见,第一点就是“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思想。工业支援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是工业的重大任务。工业区、工业城市要带动附近农村,帮助农村发展小型工业,搞好农业生产,并且把这一点纳入自己的计划”,并特别指出:“许多三线的工厂,分散在农村,也应当帮助附近的社队搞好农业生产。一个大厂就可以带动周围一片。”(《关于发展工业的几点意见》,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8页)这说明当时中央也希望三线建设带动附近地区的城市化、现代化。陈熙

的《三线厂与农村的互动关系——以上海小三线建设为中心》论证了上海皖南后方基地各小三线厂与当地农村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指出这种关系背后的驱动力(《二十一世纪》2019年2月号)。

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全国掀起现代化建设的高潮。我们观察到,这些经济决策对三线企业的布局并没有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大三线企业建设仍在继续。只是小三线建设受到的影响较大,如上海小三线从皖南撤离,企业转交给当地管理。这说明国家对三线建设的布局仍是非常认可的,只不过会根据各地情况进行相应调整。有学者指出:“三线地区尽管是以备战为目的形成的,它仍然具有战略大后方和经济区域两方面的含义。只是在不同的时期,按照不同的要求,它的表现形式不同,侧重点不一样。在国民经济的改革和发展时期,应该侧重经济区域的含义,从经济建设的角度,分析和研究经过大规模的三线建设,三线地区形成的生产布局和能力,所存在的问题和困难,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产生的作用和影响。”(林凌、李树桂主编:《中国三线生产布局问题研究》,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第5页)这是很有见地的。三线建设总体上看是必须的,但不同时期的建设任务需要结合时代要求予以调整。

三、从微观历史地理角度看三线企业的选址

三线企业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并不完全是军工类企业。在军工类企业中,也有生产不同类型武器的区别。不同类型企业的选址需求是不一样的。我们以往强调三线建设的选址受“进山、分散、进洞”政策的影响,选址多不科学。如果我们深入分析大、小三线企业选址的原因,就会发现这些认识并不确切。第一,我们要认识到,确实有些企业受当时错误的选址思维影响较重,选址不科学,导致企业发展不利,甚至半途而废。第二,我们也要看到,有些军工类产品是需要进行隐蔽建设的。第三,更多的企业是进行多方查勘后结合实际做出的选择,在以后的发展中较为顺利。这些选址比较成功的大、小三线企业,基本位于历史交通要道附近,或者是历史上曾经繁荣过的、或在当地较为繁荣的县城、市镇。中央

在1958-1960年曾重点在四川德阳建立一个与东北、上海分工合作的全国第三个重型机械、大型发电设备工业区,曾快速发展,但因为“大跃进”的失败,迫使四川省委于1960年6月29日撤销德阳工业区工委、建委,影响了其发展。周明长指出,“但德阳工业区所遗留下的大量工业用地、厂房、生活用房和初步形成的交通市政设施,为三线建设选址德阳提供了优越的前期基础”,到1978年,中央、四川省和绵阳地区在德阳共布点20余个大中型企事业单位(不含县属国有企业),基本建成为三线最大的重型机械工业基地(《三线建设时期的中国城市化——以四川德阳为中心》,《江西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山东民丰机械厂是山东省的小三线企业。有人回忆,民丰机械厂选址时遵循了“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选在了三县交界处,“此地是山多、石头多,水少、土少、树少、草少,当然人口也少,当地人称‘兔子不拉屎’的地方”(李文明:《建厂回顾》,见张志强主编:《三线军工岁月——山东民丰机械厂(9381)实录》,上海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9页)。实际的选址过程较为复杂,当时,山东省成立了小三线建设指挥部并设在蒙阴岱崮公社坡里街,现场统一指挥民丰厂、工模具厂、前进厂、光明厂等企业的选址工作。1965年5月,山东民丰机械厂筹建小组成立,到11月厂址选定,“选址先后有三次设想:一次在现今坡里镇龙旺村;二次在公庄村附近;根据水源情况和战备防空要求,最终定点为蒙阴县坡里镇筑篱坪两条山沟中”(《大事记(1965-1992年)》,见张志强主编:《三线军工岁月——山东民丰机械厂(9381)实录》,上海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页)。因为民丰厂未来产品生产用水量大,所以“筹建小组将要有充足的水量作为选址的首要条件”,最终找到了“唐王崖下面的泉水,用抽水机抽了两个小时水面没有升降现象,完全能满足生产、生活需求”(张志强:《创业者》,见张志强主编:《三线军工岁月——山东民丰机械厂(9381)实录》,上海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2页)。可见,当时的选址考虑了防空的要求和水源的因素,并不是故意选择艰苦的地理位置。

客观地说,三线企业选址有些并不好,但这不一

定是其发展不佳的主要原因。贵州朝晖机械厂1966年筹建,旧址位于息烽县城西郊王家大坡,今北门永靖大道开磷新城、宏盛塑料有限公司一带。1977年到1978年,是朝晖机械厂发展的巅峰时期,总产值分别完成505.13万元和504.6万元,实现利润38.74万元和98.07万元。但该厂却从1980年开始亏损;1986年与贵阳市粉末冶金厂合并,选址在花溪区金竹镇;1987年开始重建新厂;1992年全部迁到花溪区金竹镇后,由于负债过大,造成资不抵债;1993年停产;1998年全面停产整顿;2004年破产拍卖(《追溯息烽三线企业之——朝晖厂》,2018年5月25日, <https://m.yougui-zhou.net/guiyang/2018/0525/3196.html>, 2020年8月3日)。这说明,在不受三线建设思想影响的1986年,其重新选址建厂也没能再创辉煌,最终破产,反而是当年的旧址出现了宏盛塑料有限公司这样的大企业。

四、从近四十年来的市镇发展反观三线企业建设

大、小三线建设都是从1964年开始在全国逐渐推行的,但结束时间并不一致。早的20世纪70年代就结束了。基本上到80年代中后期,三线企业的发展就非常艰难。很多企业破产,有的企业破产重组后焕发生机。企业破产不能仅仅归咎于当初的选址,也与企业的管理以及企业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有关。如果我们要讨论三线企业对当地发展的作用,那么近四十年来当地的发展态势和人才流动无疑是一个重要角度。

大三线企业至今在西部地区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很多都是当地的支柱企业。各省的小三线企业基本上都解散了,命运较为悲惨。但这并不能说明当初的选址就一定是错误的。以安徽省宁国县的小三线为例,上海将皖南小三线企业全部移交当地处理时,宁国县政府本着充分利用的原则,将这笔资产分散到不同的企业,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在改造过程中,有些企业是离开了当初选址,但这也不能说明当初的选址是非常失败的,而是当时经济发展的需求或企业决策者定位的结果。近四十年来,在当初小三线企业所在的乡镇,重新兴建了多个企业,发展势头良好。

当然,从历史地理维度看三线企业的发展,既要

看到这些企业选址的可行性,也要看到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难。这些选址在布局上是较为合理的,但建设的过程却是非常艰辛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有那一代人有“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精神,能够在艰苦的环境下筚路蓝缕,开辟出当地的良好环境,为之后近四十年发展奠定了基础。如果换成现在,其开发的经济成本和人力成本无疑太高,甚至可能无法去开发。当年的三线企业建设,受到防空备战思想的约束,在选址上较多地倾向于环境艰苦的山区。这种以“不占良田好土”为宗旨的建设,对于当前我国需要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的土地利用来说,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当前的很多建设占用良田,而不愿意去艰苦的地区开发,这是令人非常痛心的行为。

1993年,毕节市的企业家张永学修建恒通汽车修理厂。据报道:“选址时,为不占良田好土,她把厂址定在了洪南路口至关门山的一个陡坡上,这个地段当时无水无电,电要自己发,水要用拖拉机去运。怕走崎岖路,莫想登高峰。为让修理厂早日建成,张永学不分白天黑夜同工人一起加班,很多时候连吃饭都忘了……经过一年多的艰苦付出,修理厂终于建成并正式营业。在张永学的精心经营和管理下,修理厂的生意异常火爆。地区邮电局看中了修理厂的开发环境与价值,以雄厚的资金购买,这为张永学的下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刘广琴:《让慈善之光照亮人们的心灵——记毕节市宏蓝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永学》,《试验区之窗》2014年6月5日, <http://www.bjsyq.cn/article/201405/4876.htm>, 2020年8月3日)。这充分说明环境恶劣只是暂时的,是可以改变的。在相对落后的地区建设企业的目的就是要促进当地的发展,因此必须克服一时的困难。

评价三线企业的建设,需要关注长时段的土地利用方式。很多土地在以前或当下,可能不显得那么珍贵,甚至比较恶劣,但在未来则价值非凡。很多三线企业选址的环境在当时是十分艰苦的,但从近四十年来的发展来看,这些地方逐渐繁荣起来。当时的一些山区荒地、废地,已经成为高价的开发区。这些土地利用带来的变化,也是我们应该借鉴的。

五、从历史人才空间流动看三线地区的发展

科学是第一生产力,能发挥科学作用的是人才。越是经济发展薄弱的地区,越是缺乏人才。国家至今都在鼓励优秀人才支援边疆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地区,但收效并不明显。在一般情况下,人才总是想去经济发达的地区工作,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线建设采取的是“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措施,政府采取鼓励甚至命令的方式,才使得一大批东部地区或本省的优秀人才得以在三线地区发挥重要作用。例如,“青海的‘三线’建设于1965年开始,到1973年结束,历时不到10年。但据资料显示,青海齿轮厂、青海山川机床铸造厂、西宁钢厂等三十余家企业的迁入以及随迁而来的上万名职工成为青海机械工业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填补了青海省不少工业门类、行业和产品空白”(花木嗟:《“三线”企业的前世今生》,《青海日报》2017年8月14日,第5版)。不仅青海这样的省区得以留下优秀的人才,东部地区的小三线企业,也因为这次大建设得以迁移本省和外省的俊杰。山东民丰机械厂的干部职工都是经过严格的政审,从各地单位和企业中挑选的精兵强将,包括从青岛、淄博、济南、烟台、潍坊等各地市调入的业务干部和技术人才,也包括从重庆451厂由毕玉山厂长带队调入的40多名业务骨干以及从东北321厂调入的几十名干部和业务骨干(张志强:《创业者》,见张志强主编:《三线军工岁月——山东民丰机械厂(9381)实录》,上海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6页)。这样规模的人才流动,不仅在当时,即使是现在,也是不容易实现的。

结论

三线建设开展至今,经历了五十多年的风风雨雨,留下了大量的工业遗产,对国家经济格局、企业的发展、个人的成长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值得我们从不侧面予以考察和评估。以上从全球历史地缘结构看三线建设的合理性,从国内历史地理格局看三线建设的必要性,从微观历史地理角度看三线企业的选址,从近四十年来的市镇发展反观三线企业建设,从历史人才空间流动看三线地区的发展五个方面进行宏观分析,初步从历史地理学维度讨论了三线建设的原因和巨大影响。当然,如果从历史地

理学的各个要素,包括地貌、交通、聚落、人口、生态等,考察每个企业甚至具体到当事人,研究三线建设对各个区域不同时段的影响,则又会更加深入。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各地城市乡镇的发展。这就要求政府在指导企业选址时不能严格按照企业的最佳需求去布局,而要在更大范围内组合自然因素、整合社会文化要素,带动全国的发展。

三线建设最关键的时期基本与十年动乱相始终,其发展也受到这十年政策的影响,之后又面临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这些都会影响我们对三线建设的价值判断。结合历时性、空间性对三线建设进行考察,无疑可以得到比较可靠的定位,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片面的看法。

三线建设时期内迁职工的集体文艺生活 ——以音乐生活为中心

苏世奇

【作者简介】苏世奇,遵义师范学院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

【原文出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武汉),2021.1.142~145

三线建设时期内迁职工的集体文艺生活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码,营造了内迁职工精神世界的文化空间,记录了彼时的历史风貌,成为一代人难以抹去的集体记忆。在众多的文艺生活中,音乐生活以其趋集体化的组织特征和极富宣传动员性的政治功能被广泛开展,成为内迁职工集体文艺生活的重要内容。立足文艺生活共性的基点,以音乐生活为切入点,对内迁职工集体文艺生活的功能类型、形态特征与组织运行进行考察,不仅有助于了解不同环境下文艺生活的存在状态,而且对新时代单位集体文艺生活的构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单位制视角下三线建设集体文艺生活的三种类型

内迁职工集体文艺生活基本类型的形成是建立在线企业单位制功能基础之上的。单位为充分发挥其政治动员、社会控制的功能,构建了一整套与之

相适应的文艺生活(吴海琳、王晓欢:《“单位文艺”与国企动员——计划经济时期Y厂的个案分析》,《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8期)。

(一)政治动员型

“政治动员型”文艺生活是指在特殊的时间节点,借助于政治性节日或重大历史事件所开展的具有明确主题和动员意义的仪式性文艺活动。集体仪式性活动在识别群体成员、保证群体成员对群体的承诺、产生集体凝聚力和亲社会行为的过程中有重要作用(邹小燕、尹可丽、陆林:《集体仪式促进凝聚力:基于动作、情绪与记忆》,《心理科学进展》2018年第5期)。“政治动员型”文艺生活又可分为政治性节日中的文艺生活和生产建设关键节点的文艺生活。

第一,政治性节日中的文艺生活。政治性节日是国家培养公民效忠国家、献身民族的重要时空载体。在这些节日当中开展丰富的文艺活动对于强化公民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对制度的认同具有重要意义。就艺术作品风格而言,政治性节日中的文艺作品风格多是对政治话语权力本身的艺术图解,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文艺叙事。

第二,生产建设关键节点的文艺生活。生产建设的关键节点对单位具有重要的意义。单位文艺作为一种象征符号和社会价值的话语系统,以群体叙事的形式形塑单位的价值特征,规约集体的思想与行动,文艺活动呈现出对关键节点本身的文艺叙事和群体情感的正向凝聚特点。

(二)交流慰问型

在各单位的交流慰问中,文艺活动常会伴随左右,成为满足个体情感需求、体现人文关怀的主要途径。这类文艺生活,我们称之为“交流慰问型”文艺生活,可分为内部巡演和外部送演两种形式。

内部巡演,小到企业内各部门之间,大到不同企业、行业之间,均有存在。内部巡演中的文艺作品多以反映本单位和交流单位中喜闻乐见的事迹为创作蓝本,易引起职工的共鸣。在这一过程当中,文艺宣传队作为活动主体,队员的个人才艺得到充分展示,作为非生产技能的另一特长在更大层面得到认同,队员的自我价值得到实现。而对于部门、单位而言,

文艺宣传扩大了不同群体间的社会交往范围,满足了单位群体的交往需求,为原本相对封闭的三线企业带来了更多的活力和生机。

外部送演主要是指国家专业文艺院团受国家机关、部门委托为三线建设者送来文艺演出以传达上级关怀的类型。外部专业院团的送演活动多以经典剧目为主要内容,同时辅以代表国家对三线职工关怀的文艺作品,以较高的演出水平在厂矿上演。这不仅极大地满足了内迁职工的审美期待,而且以官方的话语重构了内迁职工获得自我尊重和价值实现的需求,成为三线建设时期内迁职工文艺生活的有益补充。

(三)精神满足型

精神生活作为人类内心世界构建的生命框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人的外在行为。为不断丰富内迁职工的精神世界,单位组织了形式多样的、以满足职工精神需求为主要目的的文艺生活,我们称之为“精神满足型”文艺生活。这类文艺生活又可分为即时文艺宣传活动和内部汇演式的文艺演出活动两种。

首先,文艺轻骑兵式的即时文艺宣传活动。在建设、生产场合,为缓解疲劳、鼓舞干劲,一支支乌兰牧骑式的文艺小分队以三到五人为一组,表演歌舞节目,为建筑工地带来了欢乐,加强了单位与个体间的有效沟通,提高了观者的思想觉悟。这类作品短小精干、即兴性强且多诙谐幽默,极具亲和力。

其次,内部汇演式的文艺演出活动。单位定期组织专门的内部文艺汇演,展现集体风貌,丰富职工的精神生活。这些作品多反映各部门、单位一年当中的新进展、新气象,具有较强的单位属性和娱乐性,同时引入竞争、评比的机制,进一步增强了各单位内部的集体价值认同。

总之,不同类型的文艺生活在各单位中不同程度地存在,既自成一体又相互联系,在精神生活相对单一的条件下有机开展,成为三线建设时期内迁职工重要的精神食粮,在丰富内迁职工文化生活、满足精神需求的同时共同推动着单位功能的实现。

二、以音乐为中心的三线建设集体文艺生活的三种形态

为充分发挥文艺的宣传、动员作用,内迁职工创

作、表演了不同形态特征的文艺作品。这些文艺作品一方面反映了国内文艺生活的主流趋势,另一方面也深深地打上了三线建设单位和地域文化的烙印。

(一)国内主流音乐形态:革命歌曲、革命样板戏

从宏观视角来看,“文革”时期的文艺形态对“文革”及其以后的文艺形态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三线建设进程中的文艺同样如此。

首先,革命歌曲。“文革”时期正是国内革命歌曲蓬勃发展的时期,全国上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歌咏运动,涌现出了一大批家喻户晓的革命歌曲,如《我们走在大路上》(李劫夫词曲)《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李之金词曲)《社会主义好》(希扬词,李焕之曲)《学习雷锋好榜样》(洪源词,生茂曲)等。这些歌曲在丰富大众审美体验、满足群众精神需求的同时,更多地发挥了政治宣传与教育的功效。

其次,革命样板戏。国家意志的在场,特别是“文革”期间革命样板戏借助于政治的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播,形成了以样板戏为主导的文艺生态话语系统。这一生态系统对内迁职工的音乐生活同样产生了较大影响。一方面,各单位纷纷组建样板戏剧团,各种级别的样板戏调研活动大量开展。另一方面,样板戏中所呈现的“主题先行”“三突出”“两结合”的创作原则也被各类艺术创作所严格遵守。

革命歌曲和革命样板戏作为国内主流音乐形态,借助于政治的力量和音乐自身的艺术美感,深刻地影响了内迁职工的音乐生活,构成了内迁职工文艺生活的主流形态,成为一代人集体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单位特色的音乐形态:颂歌、劳动歌曲

如果说以上属于国内主流音乐形态在内迁职工音乐生活中存在的话,那么对于单位优秀人物的歌颂所产生的颂歌和对生产、生活场景的描摹所产生的劳动歌曲则属于内迁职工音乐生活中具有单位特色的音乐形态。

第一,颂歌。三线建设时期,内迁职工以自己身边的优秀人物、典型事件为题材,创作了大量音乐作品。这些作品既包含对生产建设有重大影响的人物的颂扬,也包含对身边小角色的塑造。例如,对生产建设中做出突出贡献的领导人物、烈士等的歌颂,在

单位职工中广泛传播,起到了标杆示范的作用;对劳动模范、驾驶员、厨师等身边小角色的塑造,以生动朴实的笔触竖起了群众身边的一个个坐标。这类作品虽包含个人崇拜的因素,但更多的还是从文艺的视角表达了三线建设者的奉献精神 and 革命情怀,反映了集体的价值取向。

第二,劳动歌曲。源于生活是艺术创作的主要途径,内迁职工的主要任务是生产建设,反映内迁职工生产建设的劳动歌曲在音乐生活中也大量出现。例如,反映基建施工场景的《战火海》《工地施工战》《快乐的斗车手》《高原英雄赞》等;反映煤炭行业早期矿井生活的《赶着马车下矿来》《工地铁工组》《煤海深处炼红心》等。这些作品刻画了内迁职工身边熟悉的劳动建设场景,既鲜活又极具亲切感,使内迁职工在音乐作品的语境当中感受生活的情趣,获得情感的满足。

对内迁职工奉献精神与生产场景的文艺图解,是对三线建设艰苦环境的本能反抗与具象礼赞,呈现出鼓动、宣传的功效,进一步彰显了文艺在企业文化中的功能。

(三)地域特色的音乐形态:飞地音乐、本土音乐

独具地方特色的民间音乐是某一区域在历史、地理、生态的基础上生成的具有情感记忆与民族、区域认同的文化符号。

首先,飞地音乐大量存在。三线建设时期,大批建设者从东北、中原、东南等地迁入西部。由于迁入地多为“靠山、分散、隐蔽”的交通闭塞之所且自成一体等方面的原因,三线企业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王国”。这就为文化空间上“飞地”的产生奠定了基础。音乐在移民文化空间的构建中可以起到维系情感认同和强化族群记忆的作用,来自对故土眷恋之情和情感记忆的音乐文化便在异乡生根发芽。这些飞地音乐在为内迁职工文艺生活带来生机与活力的同时,也作为一种文化表征方式唤起了内迁职工的身份认同,产生了特有的亲和力。

其次,本土音乐素材的吸收借鉴。迁入地的封闭环境使得当地保留了较为完整的本土音乐素材。这些丰富的地域文化也成为创作人员的一笔资源。

文艺工作者利用新鲜的文化资源在音乐创作中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并在观众中产生了一定的反响。这些独具特色的艺术作品在单位中悄然出现,反映了在一统化文艺格局下人们对多元化审美的情感诉求。

主流形态、单位特色和地域特色的文艺作品不仅反映在音乐当中,也反映在美术作品、文学作品当中。这些不同形态的文艺作品共同构筑了内迁职工的精神空间,在实现政治功能的同时,也丰富了内迁职工的审美体验。

三、人员、物资、场地:三线建设集体文艺生活的构建与运行

单位集体文艺生活的开展依赖于观演群体的组织、物资的购置与管理、演出场地的建设等。单位充分发挥其制度优势,在“先生产后生活”的政策指引下,伴随生产效能的提升、生活条件的改善,不断提高职工文艺生活质量,保障了文艺生活的正常运行。

(一)观演人员的组织

演职人员的选拔与观众群体的组织是集体文艺生活得以开展的基础。三线建设单位演职人员的选拔大都经历了从业余到专业的渐变过程,观众的组织则经历了由自发参与到“权利”象征的阶段。

首先,演职人员的选拔。为丰富职工的文艺生活,各生产建设单位逐级选拔具有文艺才能的职工组建文艺宣传队,负责单位的文艺宣传。这些演员平时负责生产建设,演出期间就被临时抽调,专门从事排练、演出工作。这种选拔方式在三线建设初期的各厂矿普遍存在。三线建设中后期,随着内迁企业建成投产,经济效益不断好转,单位为进一步提高演出水平,在原有宣传队员的基础上先后组建专职的文艺团体,以满足单位宣传和职工审美的需求。

其次,观众群体的组织。三线建设初期,由于演出场所大都在露天开阔的空地进行,每逢有演出活动,单位就会在高音喇叭中反复广播,人们到指定地点观演。随着俱乐部的修建,各种演出一般会在俱乐部进行。工会按照各单位的人数印制一定的票据,作为一种福利发放给各单位职工。无论是早期的高音喇叭通知,还是后期的票据发放,作为文艺

生活顺利进行的一种保障机制和内迁职工权利的一种社会化隐喻,在协助单位管理内迁职工现实与精神生活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二)演出物资的购置

演出物资是文艺生活得以开展的重要保障,主要包括乐器、灯光、音响、服装、道具等。集体文艺生活所需的各种物资基本上经历了从自己制作到单位统一购买的过程。

三线建设初期,演出物资极为缺乏,一些简易的乐器、道具、服装等多为自己制作。随着宣传工作的大量开展,这些简易的乐器、简陋的演出设备难以满足单位开展文艺活动的需要,于是由单位集中购置的演出物资作为国有资产大量出现。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大量管弦乐器、灯光、音响、服装、道具等演出物资的购置更多的是一种单位功能的彰显,特别是在物质生活相对贫乏的年代,演出物资的批量化采购以及所需的大量经费支出,只有依靠单位才能够完成。

(三)演出场地的建设

演出场地是提升演出品位、满足演员与观众舒适感与获得感的重要物质载体。三线企业开展集体文艺生活的演出场地大都经历了早期的简易露天舞台和后期的俱乐部两个阶段。单位修建的露天简易演出场地和俱乐部大都具有演出、展览、会议、观影、用餐等多种功能,是三线企业开展集体文艺生活和传播单位意志的重要载体。这些演出场所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场域,构筑了集体共享精神生活的文化空间,强化了单位职工共享集体劳动成果的成就感和获得感。

三线建设时期内迁职工的集体文艺生活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总是饱含明确的主题和目标,对职工群众具有积极向上的价值引领和思想教育作用。在传播媒介相对单一的计划经济时代,由此所产生的强烈集体意识、协作精神以及情感认同等积极因素,在满足职工精神需求的同时,借助高度行政化的单位组织,把党和政府的各项决议、企业所需传达的精神意志迅速地传递给最基层的民众,对单位职工步调的一致起到了促进作用。